

反古典の政治経済学



阅读日本
书系

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下）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绪论

〔日〕村上泰亮/著

张季风/丁红卫/译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反
古
典
の
政
治
經
濟
学



阅读日本
书系

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下）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绪论

〔日〕村上泰亮/著
张季风/丁红卫/译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0-76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上、下册)/(日)村上泰亮著;张季风,丁红卫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7-301-21796-2

I. ①反… II. ①村… ②张… ③丁… III. ①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6970号

Nijuisseiki eno Joseitsu — Hankoten no Seijikeizaigaku Ge

Copyright © 1992 Yasusuke Murakam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 Ltd.

书 名: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上、下册)

著作责任者:[日]村上泰亮 著 张季风 丁红卫 译

责任编辑:马 霄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1796-2/F·344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em@pup.cn QQ:552063295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mm×1300mm 16开本 41.5印张 579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85.00元(上、下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Contents

第七章 成本递减的经济学	271
第一节 开发主义的政治和经济	271
第二节 新古典派的成本递减分析——幼稚产业论批判	279
第三节 幼稚产业的替代品	289
第四节 成本递减的反古典式分析	309
第八章 作为体系的开发主义	329
第一节 产业政策	329
第二节 开发主义的政策体系	337
第三节 非开发主义的失败案例	357
第四节 开发主义与古典式经济自由主义	366
第九章 国际经济的多样化	379
第一节 开发主义的国际含义	379
第二节 国际公共产品的再探讨 1——国际通货	386
第三节 国际公共产品的再探讨 2——海外投资与援助	402
第四节 国际产业政策的可能性	416
第十章 新国际体制的蓝本	
——多样态的自由主义规则	426
第一节 再论民族主义的历史	426
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继承者	432
第三节 地区性安全保障同盟的可能性	445
第四节 经济组织的多样性——与开发主义间的关系	461
第五节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规则——开发主义的对策	473

第十一章 技术·经营·议会政治	
——有关三个问题的备忘录	495
第一节 技术发展的视角	495
第二节 从日本企业异质性的视角考虑 1	
——系列化和雇佣制度	521
第三节 从日本企业异质性的视角考虑 2	
——相互持股与金融政策	542
第四节 从批判民主主义的视角考虑——自由与平等	568
第十二章 对于理解的解释	589
第一节 文化说明的三种形态	589
第二节 若干的哲学准备	594
第三节 日本文化中所谓的“暧昧性”	618
跋——著者简约	634
索引	640

第七章 成本递减的经济学

第一节 开发主义的政治和经济

资本主义、产业化、开发主义

通过前面几章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必须对资本主义和产业化加以区分。第二，产业化至少具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开发主义两种形态。在此之前多数学说都认为产业化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延伸，开发主义则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畸形变种。在本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前的那些说法其实是不充分的。

先就第一个论点来说，迄今为止经济学大都没有将产业化与资本主义加以区分。它们实质上是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一种静态的（static）均衡论分析。换言之，它们并没有将技术创新和动机形成（motivation or incentive）的问题包含在理论体系中。然而，在此之前产业化（在此我们暂且理解为人均生产的持续增长）很明显基本上都是靠持久性的技术创新以及金钱激励（pecuniary incentive）的普遍化来支撑的。事实上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以前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的产业化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特点与其最为相近，但在产业革命完全出现之前斯密就已经辞世。不过，他似乎预感到了存在某种与产业革命相似的东西。李嘉图和马克思，或是本章将提到的马歇尔都致力于产业化经济学的研究，但他们的成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李嘉图的研究除外）并没有被后来的

经济学家发扬光大。现在主流的新古典派经济学也只有一些拼凑而成的产业化分析。

如果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经济学，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各种经济现象。“开发主义”便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若从纯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开发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基本形态中的脱离，或者说只是一个允许用来作为过渡的例外。但若从产业化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开发主义——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一起——都是产业化应有的一种形态。

事实上，“开发主义式”的发展、“产业化→民主化”这种形式的发展也绝非例外。上一章曾讲到，纵观近现代以后的历史，我们经常可以在以英、德、法等为代表的欧美诸国看到开发主义或者是类似开发主义式的局面。但是这些例子并未被归入后来的“幼稚产业论”的框架并从正面来对它们加以分析。日本这一显著的成功案例，一般也被认为是一个特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事实告诉我们，日本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在东南亚，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等成功完成向产业化起飞的开发主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15年以上，培养了一批经营人才，产业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在中南美的墨西哥和巴西，东盟（ASEAN）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发生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也非常大。NIEs的成功层出不穷，已经成为超越日本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成功案例。“开发主义例外说”明显偏离事实。因此，为了维护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我们将抛弃这种“例外说”，取而代之采用“过渡说”，即开发主义仅仅是向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必须重新验证，开发主义是否仅仅单纯是个过渡性阶段。这是今后在考虑开发主义的世界体系时必须提及的问题之一。

在此，首先要寻找一个更加明确的定义，来取代“产业化→民主化”这一含混不清的说法。

所谓开发主义是指，以私有财产制和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为基本框架，以达到产业化（即人均生产的持续增长）为目标，只要有助于实现目标，就从长远观点出发容许政府介入的一种经济体系。开发主义显然是以国家或地区（或类似的政治统合体）为单位来设定的政治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对议会民主主义产生一些制约（君主制、一党独裁制、军部独裁制等）。

另外，之所以要在此加上“从长远观点出发的介入”这一限定，是为了阐明即使采用短期的反循环政策，即凯恩斯政策，如果仅有这一点的话，也不能称之为开发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本身并不关心经济增长，是不具有开发主义特征的政策。

以上的定义有着重要的内涵。开发主义以国家或类似国家的政治统合体的存在为前提。换言之，开发主义是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的产业化理论或政策，是过去重商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形式。因此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发挥着中心作用。与之相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一直主张经济从政治中独立，同时也从国家主义中独立出来。但事实上从上一章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产业化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总是相互作用、纠缠在一起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也不例外，依靠欧洲特有的国民国家体系来支撑。最近的霸权稳定论也是为确认全世界范围内而非个别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相关性而进行的一个尝试。显然，当前有必要放弃古典的政经分离的观念，对产业化和国家主义，或者产业化和民主化的关系进行分析。

产业化与民主化的共存性

我们先前将“民主化”定义为自由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某种复合体）的制度化，认为其实现形态事实上仅仅是某种形式的议会民主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然而，议会民主制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下面，

我们就从给出议会民主制最标准的定义开始进行论述。^①

(1) 参政权范围的广度。面向国家决策的最高机构——议会的参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范围足够广，这一般被认为是民主主义的古典式定义。从历史上来看，其范围从有限选举制到完全的普通选举制在不断扩大。事实上即便是在英国，女性选举权的完全实现也是1928年的事。参政权的范围越大越好这一主张也未必得到公认（参见第十一章）。

(2) 多元主义（pluralism）或者多数政党的存在。现在多数意见都认为，不应单纯扩大选举权，而是应该同时面向选民设置多样化的选择对象。这意味着多数政党不会有名无实，而会成为实质性存在。不过也许有人对这一定义不太满意，比如有人会提出与以下（3）或（4）相同的条件。为了表明民主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我们在此也将这些条件加以列举。

(3) 政权政党交替的可能性。将两党制视为理想化的人，往往会以是否有执政党的交替来判断是否是真正的民主主义。按照这种观点，像瑞典、印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这样一直是“一党主导（one-party dominance）”的国家，像意大利这样战后一直是保守联合政权的国家，它们是否是民主主义国家这一点就会受到质疑。但如果那样的话，对民主主义政治原动力的理解就过于狭隘。即便没有执政党的交替，只要存在能够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性政策的在野党（用经济学里的话来说，只要存在政策的“潜在竞争性”（contestability）），就存在潜在的政党间的竞争。另外政党内部领导人

^① 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严密定义理论，广为人知的是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Chp. 3（他将其称为 polyarchical democracy）。不过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进行如此细致的讨论。关于民主主义的各种可能性，请参照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的更换也提供了充分的政策选择范围。两党制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形态，尤其不应忽视选举制度的影响。

(4) 经济自由主义的完成度。很多英裔美洲系的保守党人都认为，议会民主制自然应选择古典式的市场经济制度，允许行政介入的议会不具有真正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性质。也就是说按照这种观点，民主主义式的议会理应支持古典式的经济自由主义。然而按照这种论点，不光是开发主义，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法、北欧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权也可以被视为脱离了自由民主主义（这些政权一再主张产业、企业的国有化），对凯恩斯主义也产生了怀疑。这一主张看起来过于狭隘，但为了进行后面的讨论，在此先将其列出。

另外一点非常明显的是有必要将产业化进行某种最低限度的政治性统合。前面已经提到，第一，支撑市场经济的最低限度的制度，用经济学术语表达即广义上“公共财产”必不可少；第二，广义的再分配不可或缺。若没有某种政治性统合，这些问题便无法解决。但如果仅指定最低限度的作用，就无法从根本上确定统合的全体内容。事实上纵观历史，绝对王权、一党独裁制、军部独裁制等都是支撑产业化开始的政治统合体的例子，他们受到议会的牵制程度也各不相同。当然，像英国和它的殖民地那样，最初由极其发达的议会民主制来提供产业化所需的政治性统合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然而，在迎接产业化开始这样一个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历史分水岭的大变革之时，其所需的政治性统合是否总是依靠议会民主制来完成的呢？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很明显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作为社会意愿决定方式来达成的全体意见的一致”。然而，对像被冠以国家（state）之名的这种大范围的集团来说，满足这一条件并不容易。不仅如此，即便在发达国家，议会民主制流于既成权利间的妥协，成为与社会的大范围变革格格不入的体系的例子

也屡见不鲜。例如，在讨论是否应在前产业社会中采用产业化路线时，如果所有阶层都拥有参政权，那么自然情况下出现多数派支持产业化路线的可能性就会很小。例如在英国，如果普通选举在18世纪就已经确立，那么产业化恐怕就难以顺利发展（可以考虑一下路德运动）。如果没有至少以经济的再分配（例如后述的农地再分配）为手段的诱导性领导力，在议会民主制下很难开辟出一条通向产业化的道路。

但是，仅靠经济的再分配一般无法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再分配，其目标归根到底还是用金钱来改变人的意见，但有着自己生活习惯的阶层，其不安和不满未必是可以金钱来补偿的。特别是拥有前产业化价值观的阶层，他们并不为金钱所动，相反他们往往会厌恶金钱。即便这些人仅是少数派，其力量也足以引发内乱，阻碍产业化的进程。所谓内乱是指反对“以多数人赞同的决策作为社会决策”的决心的一种表现。最终在前产业社会急速产业化向进军之时，民主决定很有可能一再成为产业化排斥机制。既然产业化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目标，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现上述情形也理所应当的。然而，如果落后国家的领导层以产业化为目的，担心成为殖民地而努力提高国家地位，这时他们往往会避而不谈议会民主制。其原因可想而知，不是好或不好，而是作为一个事实性的问题，企图依靠民主制来跨过向产业化的起飞期。但这种可能性不会一直存在，即便有也会很小。实际上，像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内部相对的后发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的NIEs，至少在产业化初期，议会民主制还未完全确立，开发主义就已取得成果，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至今无人能够否认这一事实。

但是产业化步入正轨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资本主义产业化拓宽了个人的活动范围，提高了生活水平，至少是增加了这种几率。这在总体上会增强其对政治话语权的要求。事实上，资本主义产业化具有不断加强议会民主制（资本主义产业化→民主化）的趋势，这一点正得到广泛认

同。当然，也存在诸如拉丁美洲的所谓“人民主义（populismo）”受挫倒退的例子。但从趋势上来说，既然开发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它就有加强民主化的趋势。这样一来，经济角度的开发主义和政治角度的议会民主制能否在步入正轨的产业化社会中并存，就成为问题所在，意见分歧也由此而生。其中一个极端的观点如前述（4）所介绍的那样，认为原本议会民主制的精神仅能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共存（议会民主制→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这一观点暗含这样一种意思，即开发主义与议会民主制的共存归根到底是仅限于产业化初期的现象，其中一种（有可能是开发主义）不久就会被摒弃。

笔者之前也曾多次强调，政治与经济这两种动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些试图为议会民主制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必然性联系的争论，一方面低估了自由民主主义所拥有的思想接受能力，另一方面以一种过于狭隘的视角来看待经济自由主义。例如战后半个世纪的日本，至少从前述（1）和（2）的意义上来说，算是一个教科书般的民主主义国家，而且同时也算是一个对经济的政治性介入相对宽容的开发主义国家。大多数日本人都支持以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保守党，其政治上的共识也容许采取开发主义政策。韩国、新加坡等亚洲 NIEs 最近正致力于议会民主制的正常化，越来越接近战后的日本。显然，议会民主制与开发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矛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没有摩擦。这种摩擦正是开发主义最大的问题之一。

过去曾有一些争论的例子可供借鉴。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曾备受瞩目的“计划经济大辩论”，就以同样类型的争论为焦点。当时多数说法都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意味着政治独裁。相反，恩里科·巴罗内、奥斯卡·兰格、J. A. 熊彼特等拥护社会主义的一方则认为计划经济与议会民主制可以共存。作为一种抽象

的理论争论（使用的是新古典派的静态模型），他们的主张并没有错。^①但之后的现实进展情况却告诉我们仅仅围绕可能性进行抽象的讨论，是无法结束这一辩论的。在之后的苏联—东欧圈（包括兰格作为初期领导人之一的波兰），议会民主制与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并没有得以共存。

今后“有关开发主义的大辩论”或许将成为以往的“有关社会主义大辩论”，当时的大辩论亦或将成为一个很好的教训。诚然，议会民主制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与经济确实独立运作，作为抽象理论，议会民主制与开发主义可以共存。然而，从确认其共存性的基础来看，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拥有各自难以改变的固有的动态，在这种固有性中，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有时相互促进，有时相互冲突。计划经济催生出的党政官僚制的动态终究是在不断排斥议会民主制。议会民主制和开发主义的关系也同样存在从共存到冲突的各种可能性。的确，议会民主制与开发主义可以共存，也存在像战后日本一样的实际例子。但现实社会中，维护这种共存性却需要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也许没有维持议会制和计划经济共存的条件那么高，但绝不能没有。

之后将进行详细论述，这种条件和计划经济一样，与官僚制的动态相关。开发主义官僚制的中立程度以及灵活应对国际国内变化的能力等都将成为重要的条件。官僚制一旦与开发主义催生出的各种利益集团一体化，形成巨大的利益组织，并且议会的政治势力（政党）丧失抑制这种官僚组织利害的能力，那么开发主义就无法发挥实现潜在增长能力这种本来的特征，变得空洞化，或者最终引起那些非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使议会政治陷入机能不全的状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开发主义所拥有的相对于古典自

① 参见 J·A·シュンペル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中山伊知郎・東畑精一訳、東洋經濟新報社、一九六二年）、上卷二九六頁、中卷三〇四頁等。Joseph A. S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 Y.: Harper & Row, 1950), p. 162, p. 173 etc.

由主义的优点便不复存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开发主义，也是出于对官僚制的不信任。但分析起来，这也是开发主义与民主化相互作用的一种动态的情况，而且仅仅是一种情况。在当今超级产业化的趋势中，促进开发主义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另外开发主义本身所拥有的多样可能性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如果不将这些因素加以充分分析，就难以解决大多数重要的现代政治经济学问题。接下来，我们将本着这一宗旨，对“开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尝试性分析。本章主要是从经济学的侧面加以分析。其内容正如本章标题所示，即“成本递减的经济学”。

第二节 新古典派的成本递减分析 ——幼稚产业论批判

马歇尔问题

在此我们简单描绘一下开发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其出发点是边际成本递减这一命题。该命题是本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并不是普遍性的法则，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是一种与其同等重要的现象。特别是在处理增长或开发这种长期性问题时，后者即边际成本递减法则就显得极为重要。

该命题与“边际成本递增法则”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相矛盾。众所周知，“边际成本递增法则”是与市场的均衡稳定相关的优雅的微观理论的来源，占据着新古典派教科书的中心位置。如今跟它唱反调恐怕会引来不少人的质疑。

* 在继续进行阐述之前，我们在此先明确两三个表达上的问题。① 与其说是“边际成本递增”，毋宁说是包含了边际成本一定这种情况在内的边际成本非递减，在此我们不过度纠缠两者之间的差别。另外顺便提一下，经济学家经常使

用“边际成本 = 平均成本 = 一定”这一假设，但这一假设的根据，仅存在于资本供给具有无限弹性的部分均衡分析中完全竞争的情况。在进行如下这种经济整体而非局部的分析时，不应使用这种假设。②与边际成本相关的递减（或递增）和与平均成本相关的递减（或递增）虽然略有不同，但在这里忽略两者的差异也并无大碍。③以下为了便于更清楚地进行说明，将边际成本递增或平均成本递增统一简称为成本递增。成本递减的情况亦然。

然而，如果不考虑迄今为止的学说发展情况，“成本递增”作为法则能够成立的实证性依据并不存在。作为企业的短期行为，的确存在因产量增加导致可见的追加成本随之增加的情况。从李嘉图开始，人们经常举出农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很多情况下即便是向一定的土地投入劳动力和资本，收益的增加部分也会减少。但对产业化的主角，产业、企业的行为进行统计学分析，却很难找出成本递增的例子（当然，在此及后文中所提及的成本均为实际值而非名义值）。特别是从时间顺序来看，单位工业产品的实际成本基本都是随时间而递减的。④

想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所谓产业化，原本就是宏观层面的人均生产率的提高，简单地讲就意味着成本递减。谨慎起见，我们进行更为严谨的讨论。人均生产率的提高就是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平均劳动力成本）的降低，但并不意味着平均总成本的降低。两者之差即为平均原材料成本与平均资本成本之和。单位原材料成本的递增通常可以不予考虑，因此，尽管人均生产率得以提高，但平均总成本的递增仅限于平均资本成本相对于平均劳

④ 关于日本高度增长长期的例子，请参照熊谷尚夫编『日本の産業組織Ⅱ』（中央公論社、一九七三年）。

动力成本增加这一情况。^① 也就是说，成本递增情况下的产业化仅限于人均劳动力资本（资本装备率）大幅增加的情况。然而，梭罗和丹尼逊以来的“增长会计（growth accounting）”分析显示，资本集约化对人均产量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这一点出人意料，这也意味着资本系数并没有多少上升。几乎所有增长会计分析的结果都显示，经济增长率中，能够用劳动力与资本的成长率来解释的部分尚不足一半。^② 除非设想存在成本递减（或收益递增）的趋势，否则无法解释剩余的部分。笔者认为，产业化意味着成本递减这一观点是一种朴素的经验性判断，产业化经济学应该是成本递减的经济学。

然而，在经济学历史上，对成本递减持反对意见的占了大多数。最明显的反对观点是李嘉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他们对资本主义产业化的未来持悲观态度，不承认收益递增这一事实本身。李嘉图从收益递增、递减的问题着手，以农业中的收益递减为原点展开了长期性分析，最终推导出从长期来看，利润率不断下降这一趋势。李嘉图并非没有注意到收益递增的可能性，但由于受到路德运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他将收益递减视为主要趋势。可是关于这些观点的解释，在他的理论中是最为含糊（但也是最有趣）的部分。^③ 李嘉图和马克思认为，最终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可能的仅仅是资本集约化，这将导致利润率的降低、资本主义的停滞或崩溃。他们明显低估了产业资本主义的增长力，与

① 将宏观经济的情况简单地进行定型化。人均生产水平 = Y/L ， Y 表示国民产值， L 表示劳动力人口。实际平均劳动力成本 = wL/Y 、将工资 w 视为一定。实际平均资本成本 = rK/Y ， K 表示资本量，利率 r 视为一定。实际平均总成本 = $(wL+rK)/Y = wL/Y + rK/Y = (w+rK/L)L/Y$ ， K/L 表示资本装备率， K/Y 表示资本系数。

② 参照黑坂佳央·浜田宏一『マクロ経済学と日本経済』（日本評論社、一九八四年）、三三頁以降。Edward F. Denison, *Accounting for Slower Economic Grow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Table 7-3. 对资本贡献度给予高度评价的有『日本経済のモデル分析』（創文社、一九七七年）、八四頁や、香西泰・土志田征一『日本経済』（日本経済新聞社、一九八一年）がある。以上両者の分析都包含资本的质的提高，技术进步也包含其中。

③ デイヴィッド・リカード『経済学および課税の諸原理』第三版、第三一章「機械論」。

其他悲观论者的论点并无区别。

与之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据正统地位的新古典派反对论的理论却含糊不清。新古典派虽然承认人均生产率提高这一产业化的基本事实，却将这一事实分解为“技术创新”和“除技术创新以外的净成本的变化”这两个要因，并对后者主张成本递减法则。但正如接下来要讨论的一样，这种分解实际上是任意的、人工的。现在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下这样的努力到底有多大意义。为此，我们可以返回新古典派分支之前的经济学，以“边际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这一基本点作为一个线索。事实上，新古典派创始人之一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线索。

可能许多人并不知道，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明确断言：在近现代产业中，成本递减（或收益递增）法则发挥着支配作用。

“总的来说，在生产活动中，自然往往扮演着使收益趋于递减的角色；与之相反，人类往往扮演着使收益趋于递增的角色。收益递增法则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会带来组织的改善，组织改善又会增进劳动和资本的工作效率……因此在那些不需要依靠土地进行产品生产的产业中，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会带来等比例以上的递增收益，而且针对自然对土地产品产量增加所产生的抑制作用，组织的改善又具有削弱甚至是压倒这种抑制作用的趋势……在大多数原料费不是很高的高度工业部门以及大多数近现代运输产业中，收益递增法则基本上都顺利发挥着作用。”^①

在自然资源发挥主要作用的产业（例如农业）中，一般呈现收益递减的倾向，而在人类发挥主要作用的产业（例如高度工业化产业）中，收益递增趋势则占支配地位。虽然马歇尔是如此断

^① アルフレッド・マシセル『経済学原理』（大塚金之助訳、改造社、一九二八年）、第二分冊、第四篇、第一三章、二八一—二八二頁。